

現
代
文
明
史

法國薛紐伯著

王慧琴譯

法國薛紐伯著
王慧琴譯

現代文明史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序

高一涵

薛紐伯（Ch. Seignobos）是法國現代很負盛名的史學家，他與那主編世界通史（*Histoire Générale*）的歷史名家拉維斯（E. Lavisse）及龍波（A. Rambaud）等齊名，稱爲法蘭西史學界三大名家。薛氏於一八五四年生於法國拉馬斯特（Lamastre），現已白髮如銀，仍在巴黎大學講授近代史及歷史方法。他曾同前巴黎大學歷史教授朗格諾瓦（Ch. V. Langlois）合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在現代歷史研究法名著中推爲最完善佳本。後來又著適用於社會科學之歷史方法（*La mé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一書，對於史料之搜輯校正考證等事理，審辨明晰，不獨增進了歷史家的興趣，並且增進了社會科學家的興趣。至於薛氏之代表著作，除現代歐洲政治史（*Histoire politique*）

que de l'Europe contemporaine) 外，就是這一部現代文明史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歷史家對於史料的選擇，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因為史料浩如煙海，而選擇的人往往就其所好而選擇一端兩端，來證明自己的偏見。例如寫太湖風景者，因為他自己祇愛一個西洞庭山，因而祇寫西洞庭山的風景，而不寫全湖的風景，一若全湖風景，都為烘託西洞庭山而生者然。舊的歷史家之編著歷史，往往因個人的眼光不同，而任意去取歷史中的重要材料。自中古迄今，歷史家有的利用歷史作宗教戰爭的武器，有的利用歷史作民族戰爭的武器，有的利用歷史作階級戰爭的武器。於是把一部完全的史料，任意宰割，隨便棄取，將本來不限於某一種顏色的歷史，染上自己所喜歡的某種顏色。歷史家拿這種先入之見為主，來編著歷史，祇可以說是理想化的歷史，絕不是科學化的歷史。這似乎仍是唯心的歷史觀，而不是唯物的歷史觀。

故歷史學家最貴的是沒有偏見，沒有主見，沒有立場。要以客觀的事實爲基礎來敘述歷史，不要以主觀的理想爲基礎來編造歷史，才可算是科學的歷史。薛氏的這本現代文明史，對於史料的選擇極其公允，不偏於一隅之見，不難以感情好惡，把歷史進程的原動力看作在全體社會，不看作在少數英雄，這是他這本書的特色。

我們今日看歷史，並不能抱着『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的見解，因爲人類是進步的，人類的歷史是時時變動的。我們要改進現在的社會，當以將來爲球門，不當以過去爲模範。故利用歷史做模範，教人去尊古，教人去盲從，都是錯誤的見解。我們看薛氏這種現代文明史，至少可以知道歷史是進步的，至少總可以打破了古今一轍的舊觀念，與盲從古人的舊心理。

王慧琴先生對於歷史素有研究，故譯筆既信且達，關於這一點，讀者自可明瞭，也無須序者的揄揚了。

二十二年中秋節高一涵序於海上寓處。

序

王靈皋

人類本身就是自然之一部分，但是他若想維持他的生存，發展他的力量，增加他的幸福，就不得不設法支配自然，利用自然，和自然鬪爭。然而人類自有始以來就是「社會的動物」，他們不但在自然界中生活着，並且是在社會中生活着。社會既尚未脫離階級性，人類便不得不分化而為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用現在的社會科學的術語說，即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利害不同的社會階層；既由此種利害不同的社會階層，則鬪爭是無可幸免的。所以自古及今，除了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以外，一部歷史就是利害不同的人羣鬪爭史，就是說，不是這一階層壓迫那一階層便是那一階層反抗這一階層的鬪爭史。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上述的兩種鬪爭——人類與自然鬪爭與人類中的社會鬪爭——交織而成的歷史，尤其是現代的文明史是

這樣。然而我們要曉得要征服自然，就不得不研究自然的運動之必然的法則。於是就發生了科學與技術，發展了他們的生產力。生產力一發展，與之適應的人類社會的組織也不得不發展。不過在私有制度成立以後人類社會的組織每當一度適應生產關係而成立之後，必爲一部分把持生產工具的社會階層所擁護，爲另一部分人所反對，不是和平地進化，而是必須經過劇烈的鬭爭才能變革的，於是而有革命。近代文明史必須從十八世紀的法國大革命說起；而法國大革命又是歐洲的資產階級反抗封建階級，從經濟學的立場說，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從封建經濟的生產力的母胎中破裂出來的一個必然的突變，因此又不得不溯源於十八世紀中葉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是人類和自然鬭爭即支配自然的一個大進步；法國大革命即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人類鬭爭的一個社會的政治的與經濟的大變革。懂得這個道理才可以了解近代文明史；懂得這個道理才可以找到一八八九年的巴黎市民爲什麼要攻打巴士底獄，一八四八年法德奧各國的革命爲什麼興起又爲什麼失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之所由產生與夫法國資產階級之所由寧願引外敵以攻本國工農羣衆之真實的解答。

法國薛紐伯（Ch. Seignobos）所著的『近代文明史』，我記得新青年雜誌（民國四年九月發行）曾登載過陳獨秀的譯文，但僅三數章而已，茲由王慧琴君由原文譯出，由亞東出版，予獲讀全本，爲之一快。此書雖不盡愜於予，然而在中國的出版界，數十年來還未見過有一部勝過牠的現代文明史，予故樂爲數言以爲介紹。

王靈皋。

目 次

第一章	十八世紀歐洲新列強.....	一
第二章	十八世紀殖民的制度.....	三三
第三章	十八世紀歐洲的改革運動.....	六三
第四章	法蘭西革命.....	一〇九
第五章	革命的功績.....	一四三
第六章	「大革命」同歐洲的鬭爭.....	一六一
第七章	督政府和帝國.....	一八一
第八章	拿破侖對歐洲鬭爭.....	二〇七
第九章	歐洲的復古.....	二二七

第十章	歐洲之立憲政府.....	二四九
第十一章	從一八四八到一八七五年之法國政府.....	二九七
第十二章	自一八四八年以來歐洲的改變.....	三二一
第十三章	土耳其帝國的分裂.....	三七三
第十四章	新大陸.....	四〇七
第十五章	歐洲以外的歐洲民族.....	四三一
第十六章	十九世紀的藝術文學及科學.....	四五九
第十七章	工業農業及商業.....	四八五
第十八章	法國和歐洲之經濟改革.....	五一五
第十九章	德莫克拉西和社會學說.....	五二五
第二十章	結論.....	五四七

第一章

十八世紀歐洲新列強

「現代文明的開端」——通常都是把一七八九年的時日作現代文明的開端。不錯，這是因為有法國的革命纔發現一些足以顯露現代文明特性的大變動。不過追本溯源，這些變動還是一直自十八世紀之初，就由一個不十分明顯的內部的轉變而準備成的。這確實是自路易十四統治的末年以來，那足以在全歐洲毀壞舊的制度並引起改革以至一個革命的新政治學說就形成了。

同時，國與國的關係也轉變了。在美洲，創立起一個英國殖民的領土，以致產生一個大的新國家——合衆國。在歐洲，十七世紀的三大強國：如西班牙、瑞典、荷蘭，都降到次等國的地位。

地位。在已喪失最高權的法國之傍，發現四個別的列強，為十九世紀的數大強國：戰勝路易十四的英國，以驅逐土耳其人而強大的奧國，還有兩個新的國家，即普魯士王國和俄羅斯帝國。

普魯士

「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王國【註一】成立於一七〇一年，他亦好比一切德意志的國家一樣，是許多疆土由統治的強族所一個個聯合起來而構成的；這可以說不是一個國家，而只是散亂于德意志各方面並無相互聯繫的一些區域的結合；有些疆土在西方的，一直達到萊因左岸，在東方的普魯士邦（Province）是在帝國疆界以外，在中部的就是卜浪德堡（Brandenburg）整個的都是很窮的，人口亦很少的（約二百萬人口）普魯士本只是一個小國。荷項索萊因（Hohenzollern）王朝使之成為一個大強國；他們對於政府沒有別的觀念，只是他們當時的侯王；這些侯王們也就施行「家族政治」，其所以擴

張他們的領域和他們的權力無非爲的增加他們一家的權力。他們也依照國家的理性的規則，使用一切方法以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他們從他們的生活的種類上與別的王不同，這就是他們之所以成功的地方。他們不把他們的收入作爲供給王朝和舉行宴會之用，他們把他全部都移歸國家的用費，尤其是軍隊的給養。

【註一】烏帝曾經把這個王的尊號出賣于卜浪德堡的羣衆人，不願意把這個尊號附屬於一個

德意志的邦名；採用普魯士名，乃是因爲普魯士不屬於帝國部份，人們遂給起之

王以「普魯士王」的尊號。——著者

* * *

『宮廷』(Cour)——佛列德尼克(Frédéric)第一乃是第一個尊稱王號者，仿照路易十四，有一個人數很多的宮廷。他的繼承者佛列德尼克·桂儒姆(Frédéric Guillaume)取消這個宮廷，只留四個侍從，四個內臣，十八個護衛，六個供呼喚者五個供打掃者。他穿一身藍衣服和白外套，時時有劍掛在身傍，杖拿在手中，他只有木製的椅子和椅子，

沒有大靠椅亦沒有氈毯他的桌子之污穢竟使他的兒子寧可餓肚皮都不肯吃飯。他的晚間的生活就是和他的軍官和他的大臣們用荷蘭的長烟筒吸煙并飲啤酒。這種粗暴的生活，有輕侮別的王的尊嚴，因而獲得「賤王」的綽號。

他的繼承者佛列德尼克第二就不同，他是很文雅的。他愛音樂，寫很好的法文，做法文的韻詩及讀哲學的著作，然而他的生活也差不多同他的父親一樣的簡單。他住在博茨丹（Potsdam）所時常接見的只是他的軍官，他的官吏及若干哲學家。他沒有宮廷（他離開皇后並不接受婦人。）他穿着補綴的衣服，他的器具都被和他在一塊過活的狗噉壞了。在他死後，所有他的動用財物只可賣一千五百佛郎。他的唯一的奢侈品就是鼻煙壺的陳列，他留下一百三十個鼻煙壺。

*

*

*

「普魯士王的預算」——普魯士王從他們個人的用費上所節省下來的錢，都移用到他們的軍隊上。佛列德尼克·桂儒姆每年為他自己和他的宮廷的用費只在五萬二千

打列（Thalers）不到二十萬佛郎。當時每年的進款已達到六百九十萬打列（約一千六百萬佛郎。）這些進款本來可以各半分配于軍事費和其他的用費上。但是實際上王在普通的用費上要抽出一百四十萬打列（五百二十一萬佛郎）放在軍隊上。因而全王國的一切用費只不過九十六萬打列（三百七十五萬佛郎）所有其餘的進款都放在供給軍隊或形成儲金上。普王竟能維持八十萬人的常備軍，死時金庫裏還留有八百七十萬打列（三千二百五十萬佛郎）的現金。佛列德尼克第二亦如他的父親一樣保留他的錢袋着軍隊和儲金。他能維持二十萬常備軍，雖然經過七年戰爭全王國都被毀了，臨死時他還遺下一個五千五百萬打列的金庫（二萬萬多佛郎）

*

*

*

「軍隊」——普魯士的軍隊，亦如當時一切別的軍隊一樣，都是由志願兵構成的。招兵官都派送到全德意志的地方去舉行招募；他們在客店裏成立辦事處，招收那些來為普魯士王服役的人。這些投軍者大都是盜匪，很多是德意志某王的軍隊中出來的逃兵。這些

招兵官們亦常常用欺騙或武力來搜羅人，用玉的金錢來引誘或直捷了當地搶奪。有一個招兵官，想招收一個好軀幹的木匠做擲彈兵，就向木匠定做一個可以載他的差不多大的錢櫃；其後木匠送來錢櫃，招兵官宣稱這個錢櫃太小了；木匠為證明不小，就睡在櫃裏，馬上人們即將櫃蓋掩起，並將櫃子扛抬以去。當人們將櫃蓋揭起時，木匠已閉塞死了。

這樣的招收是不足以招募一個所需要的軍隊。在一七三三年，普王決定要用他自己的人民完成他的兵額，他成立一種強迫軍役制。王國的各邦都劃分為若干「區」（Canton），每區應該供給必須的兵丁以助成一個兵額。一切人民都是可以徵調的，除外的只是貴族、牧師的子弟及至少備有六千萬打列財產之資產階級家族的子弟。（在普魯士這個窮國中很少有這樣富的家族。）當佛列德尼克第二的戰爭中，人是非常之稀少，竟使人們要徵集中學生。當一個小孩兒很快地長大時，他的父母就說：『不要長得這樣的快，恐怕徵兵官要來捉拿你。』

普魯士兵士是服從於一個極嚴酷的紀律。軍官們手杖拿在手中監操，那個操練不熟

習就打那個他們要使一個整個的隊伍動作得好比一個單獨的人一樣有如一架機器那樣的準確。他們兵士的背鎗是要分為十二個運動（即是十二次的背鎗法）當一個隊伍放鎗時，應該教人只能看見一個火光和只能聽見一個響聲。沒有一個國家有一個訓練這樣好的陸軍。「普魯士操法」是在全歐洲著名的。但是這樣困苦的生活自然要監視軍營以阻止兵士的逃跑；所以佛列德尼克在戰爭的時候，在他的軍隊的四圍都用馬隊圍繞起來以阻止逃跑者。

在這個軍隊中兵士是沒有一點上進的希望。軍官都是從少年貴族中提拔起來的；因為整個普魯士貴族階級都去為王服務。但是在別的國家中軍官的位置是賞賜的，甚至是出賣的，然而在普魯士要變成軍官必須經過軍事學校（陸軍初級學校）要想達到一個高的階級必須經過以下的階級。就是王族中之王子們也必須要服務，並不能越級升格。

任何歐洲政府在這時都沒有這樣一個軍隊與他的人口的比例數：一個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有八萬人的軍隊，這恰恰六倍于奧國，四倍于法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國與國